

让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不落空”②

平台薪酬体系不透明、罚款名目多数额大。一些新业态劳动者说出心声——

“我的收入怎么能拿得明白又合理？”

本报记者 卢越

“我们在访谈中接触的一位外卖员说，自己所在的站点称底薪4000元，并按照单量分段计价，500单以内每单8元，单量越高，单价越高。但是如果外卖员一个月的送单量达不到500单，收入也达不到4000元。”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近日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团队经过一项调研统计发现，有超过70%的外卖员拿的是无底薪计件工资。在一些专送外卖配送中，要达到一定的单量才能拿到配送站点所声称的底薪，达不到就按单计价。

《工人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新业态劳动者，他们普遍关心：“我的收入怎么能拿得明白又合理？”

“我怎么不知道薪酬标准变了？”

49岁的韩师傅在北京做网约车司机两年，每天清晨5点多出车，一直跑到第二天凌晨，每天平均能到手700多元，还要除去200多元的油钱和170元左右的租车费，“要想赚钱，至少得跑12个小时以上”。

对于平台抽成多少，韩师傅表示自己并不清楚，也不方便问乘客每单支付了多少钱，“平台抽成不固定，抽多少咱也做不了主，一切听平台的”。

“劳动者对于报酬的获得方式、组成内容等享有知情权。”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四川伟旭律师事务所主任杜伟接到过不少来自外卖员、快递小哥等新业态劳动者的法律咨询。他表示，平台方应当对薪酬体系组成，包括如何收取佣金等进行明示。

“对于抽成比例范围的确定，是通过双方利益博弈而最终确定的，法律上对于劳动者的保障为最低工资保护，因此抽成比例范围的确定，一是要透明公开，二是

阅 读 提 示

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名新业态劳动者，有网约车司机表示，平台抽成不固定，抽多抽少自己说了不算；也有外卖员表达了担忧：平台把佣金降下来了，会不会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有快递员则反映快递企业“一刀切”式的罚款，影响收入水平。专家表示，应确立新业态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从而确定平台从业者薪酬的最低行业标准。

要双方达成一致。”杜伟进一步解释，“平台制定了抽成比例范围后不能随便更改，而劳动者在明确知晓平台规则的情况下，如果选择接受，应当认为其已经与平台达成一致。”

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近日对外公布的一起案例中，仲裁结果强调了薪酬标准制定的程序合法性。该案中，代驾司机李师傅在发现自己的工作量没什么变化、但收入比以前明显减少后寻求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李师傅说，他的工资由基本工资4000元和业绩提成构成，公司自2020年8月开始未足额支付工资。

公司则主张，从2020年8月开始，公司对薪酬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基本工资降低了，提成标准也变了。而且，公司规定了每月的最低接单量，未达到最低接单量的不发放提成，仅支付最低工资。

对此，李师傅提出：“我怎么不知道公司的薪酬标准变了？”最后，因公司未能证明薪酬标准的变更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且制度的制定经过了民主程序、劳动者已经知晓，仲裁员未认定公司调整工资标准的合法性，支持了李师傅补发工资差额的请求。

平台会不会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

劳动者能拿多少钱、拿多拿少谁说了算？近日，交通运输部等五部门对1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针对近期个别网约车平台上的司机反映“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造成收入下降”的问题，约谈回

应“不得利用资本恶性竞争、无序扩张”“要规范定价行为，降低抽成比例”等。

此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表示，要求网约车平台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强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保障驾驶员的合理劳动报酬，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综合考虑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工作任务以及当地的平均工资、市场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地确定驾驶员的劳动报酬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记者采访中，有劳动者表达了担忧：平台把佣金降下来了，会不会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

小付是一家外卖平台的众包骑手，他告诉记者，自己拿到手的送单价降下来了。“现在下午2点以后3公里内每单差不多在4.1元，而2018年最低单价是6.1元。”

河北人慧姐也是一名外卖员，她担心的是平台“以罚代管”，自己收入还是上不去。“一次没穿工服罚300元，一次工牌没戴罚100元，后台审核没通过的话，罚款500元再加停接一天的单子。”慧姐说，“专送骑手跑一次单就赚几元钱，罚款实在是太多了。”

同样的顾虑也发生在快递员身上。近日，部分快递企业陆续调整末端派费，但快递员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快递企业“一刀切”式的罚款。国家邮政局日前指出，坚决反对企业“一边增加派费、一边增加罚款”，将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内部的“以罚代管”行为。

应确立新业态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

“相较平台，从业者没有太多议价权。”黄乐平说。在他看来，目前平台从业者薪酬主要由供需关系来确定，最初平台为吸引劳动者从业给出不错的待遇，而随着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劳动者的话语权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有一个新业态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那么就能确定平台从业者薪酬的最低行业标准，但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劳动定额标准。”黄乐平说，“应该在立法上尽快填补空白，尽快确立劳动定额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这样才能确定平台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和所对应的薪酬体系是否合理。”

杜伟认为，新业态从业者的薪酬体系制定需要结合平台自身发展、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劳动量综合确定。他进一步解释：“薪酬体系的构建，既需要法律保障最低工资标准，也需要考量行业对于从业者的需求、从业者的劳动意愿、劳动强度以及劳动可替代性等多种因素。”

“平台方应当主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或者相关的合作协议，在与劳动者构成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应当遵守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杜伟说。

黄乐平提到“从劳动关系上对平台从业者进行甄别”。他认为，不管平台采取什么用工形式，只要实质上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条件的，都应该适用劳动法的标准去实现劳动者的收入待遇。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特别是产业工会可以跟平台所在的行业协会或平台企业进行集体协商，来确定从业者的工资标准、薪酬调整机制。

“除了平台外，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加大对新业态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对明显属于规避劳动关系的用工行为加以制止。”杜伟说，“工会可以结合新业态的行业特点，指导新业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并提供相应的会员服务，对于平台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法监督。”

最高法出台意见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国实际运行人民法庭超万个 实现司法服务全覆盖

本报北京9月15日电 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单位，处于推进社会治理、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前沿，承担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职责。最高人民法院9月1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今年8月，全国实际运行的人民法庭10145个，实现人民法庭司法服务全覆盖。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介绍，截至今年8月，全国实际运行的人民法庭10145个，其中乡村法庭6201个、城区法庭1234个、城乡结合法庭2710个，实现人民法庭司法服务全覆盖，区域布局总体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全国人民法庭妥善处理大量征收征用、劳动争议、婚姻家庭、民间借贷等矛盾纠纷，注重非诉方式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2016年至2020年，全国人民法庭收案2040.8万件，审结2027.5万件，结案率约占基层法院收结案总数的25%。

“《意见》的制定出台，在我国人民法庭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划时代意义。”贺小荣介绍，《意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三个便于”。即始终坚持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便于人民群众及时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原则，不断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和时代价值。

《意见》还要求人民法庭始终坚持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在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切实实施民法典，依法妥善审理家事、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基层多发案件，畅通权利救济渠道，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深化家事审判改革，用好心理疏导干预、家事调查、诉前调解、案后回访等措施，加大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落实力度，保障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以及困难群体和特殊人群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依法妥善审理养老育幼、教育培训、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等领域案件，促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最大限度把涉军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初始阶段。

(法文)

广东 一起19年前的命案积案告破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粤公宣)记者9月13日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近日广东省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19年前枪杀杀人命案积案。

2002年10月16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发现一名女性死者。经查，死者林某于10月15日晚在自家杂货店遇害。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一份DNA样本，但在入库比对时并无比对结果。由于当时破案条件有限，警方始终未能挖掘到更多有关嫌疑人身份的线索。

今年5月广东省公安厅“平安厅”信箱开通后，收到了该案当事人家属陈女士的来信，信中希望公安机关尽快破案。“平安厅”信箱工作专班即进行研判，并及时流转至相关警种。经过重新梳理案件线索，运用新技术新手段，积极比对分析涉案物证，警方排查出福建龙岩籍男子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2021年8月12日，专案组将犯罪嫌疑人李某、古某抓获。经查，2002年10月15日案发当天，林某招待古某和李某在自家杂货店吃饭，但古李二人却借林某酒醉对店里抢劫。途中林某清醒过来，古李二人便拿起店内的扳手杀害了林某。19年后，这起命案终告破。

吉林 出台司法救助新规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近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委组织部、省乡村振兴局共同出台《关于建立国家司法救助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帮扶衔接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救助原则、救助对象和各部门救助任务，力求通过协同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切实解决农村低收入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意见》强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审判执行、检察工作过程中，发现农村低收入当事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依法及时启动司法救助工作程序，帮助其解决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并在案件办结后及时将相关情况反馈至乡村振兴部门和乡村党组织。

根据《意见》，乡村振兴部门、乡村党组织和驻村干部在工作中发现因案致贫返贫的农村低收入当事人，应当作为司法救助案件线索，及时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接到司法救助案件线索，经审查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依法及时启动司法救助工作程序，优先办理，并向乡村振兴部门和乡村党组织反馈案件办理情况。

西宁 “午间法庭”8小时之外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那生祥 通讯员范生栋)为进一步完善多元化化解纷机制，真正做到一站式解纷、全方位服务，日前，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大堡子法庭先后推出“午间法庭”“假日法庭”等。法庭在8小时工作时间外开展便民诉讼服务，既及时有效化解了民事纠纷，又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

“我们辖区内有大中型企业及批发市场，上班族和流动人口较多，一些当事人受工作、地点等因素限制，不一定能赶在上班时间来办事。”大堡子法庭庭长刘立说，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当事人因不好请假无法按时到庭参与诉讼，选择中午或其他时间段弹性安排开庭时间，进行开庭或调解。今年以来，城北区人民法院大堡子法庭已完成午间立案91件，午间调解71件，预约立案179件，午间开庭39件，使用在线平台远程调解纠纷70余件。

此外，城北区人民法院还充分利用法院信息化、联调机制建设成果，畅通线上线下非诉讼与诉讼平台对接渠道。通过电子送达、远程开庭、在线调解等一系列便民措施，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法院“跨时空审理”

9月7日，依靠AI辅助，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志在30分钟内同审10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浙江法院推出两项针对简单金融借款纠纷案件的便民举措——智能化“异步审理”及“多案联审”，为当事人提供全时空在线服务。 人民视觉 供图

退休老职工历时6年维权，在检察监督下，一起行政争议得到化解

“消失”15年的工龄找回来了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卢志坚 裴健

“补发的工资和本月新工资全都到账了，我的工龄问题彻底解决了！”日前，江苏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检察官电话回访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的申诉人戴某时，戴某兴奋地说出了这些话。

此前，为了让江苏省一县级市人社部门重新核定并恢复自己1971年至1986年之间的15年工龄，戴某经历了6年的信访、诉讼维权之路。在检察监督下，这起行政申诉案终于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66岁的戴某1971年3月进入该县级市一家镇办企业，2015年8月退休。戴某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发现由于该市人社部门没有将他1971年3月至1986年9月的工作时间计入工龄，导致他的退休工资仅有1600余元。

戴某要求该市人社部门重新核定其工龄和退休待遇，人社部门认为对戴某的连续工

龄审定和养老待遇核定没有错误。2016年5月，戴某向该县级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人社部门重新核定其工龄和退休工资待遇。法院审查认为戴某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裁定驳回了戴某的起诉。

2017年3月，戴某书面向该县级市人社部门提出申请，要求重新核定其工龄和退休待遇，人社部门答复：对他的工龄审定和养老待遇核定并无不妥。戴某不服，再次向该市政府提起行政诉讼，经一审、二审和再审，戴某的诉讼请求均被驳回。

该县级市人社部门和法院认为，戴某所工作的企业于1989年由镇办企业改为市属集体企业，镇办企业的城镇户口职工溯及补办用工手续的时间最早为1986年10月。1971年3月至1986年9月期间，该企业属于镇办企业，不能计算连续工龄并视同缴费年限。

2020年9月，戴某向该县级市所在的设区检察院申请行政诉讼监督。该院经审查后认为生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遂提请江苏

省人民检察院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调查后，确认与戴某一起进厂的多名工人和戴某在工龄认定上存在同等情形不同对待的情况。经反复核实，承办检察官确认戴某是城镇户口且属于企业正式工，符合计算连续工龄的条件，该县级市人社部门对戴某的工龄认定不合乎规定。

“戴某多年信访、诉讼维权，但没有哪个部门给其指出一条正确的路，致使他走了大量的弯路，问题得不到解决。不论本案是否提出抗诉，都要解决本案不公平待遇的问题。”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华表示。

7月8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就戴某与该县级市人社部门行政确认检察监督案进行公开听证。该县级市人社部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如若在执行有关政策中存在差错，会坚持有错必纠。7月中旬，人社部门重新核定了戴某的工龄，为其恢复了1971年至1986年之间的15年工龄。7月29日，戴某向检察机关撤回了监督申请。